



磨盘山遗址2023年度发掘区及历年发掘文物。

【史地新知】

## 磨盘山遗址，见证『多元一体』文明演进

□李令飞

江河湖海，为生命之源、文明之源。

郎溪县，取境内郎溪水而得名。郎溪磨盘山遗址北有郎川河流过，郎川河古称郎溪，发源于皖南山系，向西北注入南漪湖，然后流入长江。郎川河沟通着长江水系和环太湖水系，因此郎溪磨盘山遗址正处于古代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地理节点上。近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揭晓，郎溪磨盘山遗址名列其中，作为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

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磨盘山遗址被发现，1985年被纳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在开掘新郎川河30多年后，磨盘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开始加速。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调查，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又进行了复查，确定其为一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遗址。2015年、2016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2020年，该遗址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的核心依托遗址，202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并于2023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历年来，根据对文献、普查资料的研读以及实地调查，考古工作者初步确认了郎川河流域的数处同性质遗址，并初步认定磨盘山遗址为一处区域中心聚落。

南京大学副教授、磨盘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赵东升表示，目前初步确认现存遗址区域分为东西两块，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其中西侧区域遗存年代以马家浜文化时期至春秋时期为主，也有少量宋代墓葬；东侧区域遗存年代以商周时期为主；另外，在南部还有约3000平方米的明清遗存分布区。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掘面积共1625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前后延续的文化堆积。

今天的人们，基于众多科学普及之上的大遗址认知，既能发现每处遗址“圈地”而“自治”的“独特性”，也能感受到更多交融交往的“广泛性”。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磨盘山遗址的面貌渐渐清晰起来。

据介绍，磨盘山遗址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最为丰富。

赵东升介绍，发掘的遗物中网坠和陶

觚(xī，古代一种解结的锥子)自始至终所占比例都很高。其中，有座墓葬中墓主人头部左侧随葬了27枚陶觚，推测与遗址处于湖泊边缘、人们的生计以捕鱼为主有关。石器的数量和类型也很多，并且大多数都有使用痕迹，可能表明与石器使用相关的木工业较发达，部分石制农业工具则说明种植农业的存在。

在“水乡泽国”，水道就是路网，先民们以渔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模式化的随葬品、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表明此地可能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交换。

磨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研究。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平底釜和扁足或锥形足折腹鼎、牛鼻耳罐、红衣陶豆等，崧泽文化时期的浅盘豆形杯和带把鼎，少量的多孔石刀，小型的三足器、带把器和分体式玉璜……诸多与周边区域“同款”的文物，提示广泛存在着文化交流，表明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崧泽文化圈可能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已经开启了。

“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文明的形成与凌家滩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赵东升说，磨盘山遗址出土的大量蛇纹石玉璜与凌家滩遗址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同时在太湖南北形成相同的此类玉璜文化圈，从而为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良渚古国的诞生准备了“一统”的条件。他认为，从凌家滩到良渚，磨盘山遗址很可能是这条线路上的重要节点，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

对于一处遗址的解读中，同时出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这些名词代表着什么？从马家浜文化到夏商和西周——春秋前后延续的文化堆积，又说明了什么？

先秦时期，中华大地的文明之光星星点点。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而得名。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磨盘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将这些著名考古学文化名称一同呈现在大众面前。而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前后延续的文化堆积，证实了这是一处年代跨度近4000年的区域中心性聚落。

一处遗址，存在人类活动近4000年，是什么概念？赵东升认为，在距今6200年至2500年，磨盘山遗址所在区域一直环境优越、资源丰富，适合人类生存发展。

在近4000年漫长时光里踽踽前行的先民，要应对气候变化，要抵御自然灾害，但是，这里依旧生生不息。赵东升说：“磨盘山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延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通过对该遗址的分期研究，可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

如何演进？“新石器时代，主要围绕环太湖地区交流和演进。”赵东升介绍，夏时期与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则明显有东方和中原地区的因素。说明这个时期受到来自中原和东方文化区的影响，也体现了在中原广域王权国家建立以后，华夏和东夷势力在皖南地区的渗透和角逐。西周至春秋时期，这里基本上属于古代吴国辖区。夏王朝开启中原化进程的步伐，商朝南下，吴越争霸，这里又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驿站。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皖南地区的演进方式，又提供了一次历史的见证。磨盘山遗址，作为皖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有望为我们带来更多全新的认识。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工作单位为安徽淮纺报社)

【文化观】

## 山东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书写

□刘振

2023年8月，久居青岛的杨志军凭借长篇小说《雪山大地》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继刘玉民、张炜、莫言之后山东省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小说写了汉族援藏干部强巴一家与当地牧民一起共建藏区家园的故事，不仅以别样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刻画了彰显新时代精神的英雄群像，更是标志着山东新文学乃至新时代文学英雄形象书写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之初，作家们对“高大全”式英雄形象的塑造，表现出较为审慎的态度。如何开辟英雄形象书写的新领域和新模式，成为当时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1982年，李存葆发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较早地将沂蒙革命精神融入到作品之中，成功塑造了靳开来等有血有肉的军人英雄形象。他们敦厚朴实、勇敢无畏、忠诚爱国，并且有着属于自己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东文坛涌现出《古船》《红高粱》等一批彪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进一步突破了限制和束缚英雄形象书写的瓶颈，英雄本身的审美意蕴和文学价值不断得到凸显。

长篇小说《古船》能够成为张炜的代表作，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止具有多义的思想主题、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塑造了很多典型人物。其中，同样是军人英雄的隋大虎无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小说有意模糊了从老隋家走出的隋大虎具体的英雄事迹，而把他的参军和英勇就义诠释为一种象征着时代正在发生剧变的鲜明信号，将英雄诞生的意义从抗敌前线延伸到喻指整个中国社会的洼狸镇，并置于老隋家与老赵家的家族矛盾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接缝处考察，极大地拓展了军人英雄形象书写的基本方式。莫言在中篇小说《红高粱》中塑造的余占鳌等具有实验性质的人物形象，则是以抗战英雄与土匪这两种略带矛盾身份的奇特组合，彻底颠覆了读者关于草莽英雄的传统认知，既使英雄充满了人性的张力，还实现了体现民族国家观念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彰显原始血性的民间文化的有机融合。显然，无论是英雄形象的界定标准和审美价值，还是讲述英雄故事的基本叙事策略，从此时期开始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

时至上世纪90年代，刘玉民发表《骚动之秋》《海猎》等小说，接续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思潮掀起的创作余波，将山东新文学英雄形象书写持续推向新的阶段。长篇小说《骚动之秋》通过塑造浸染着齐鲁文化底

色的岳鹏程一家三代英雄，以父子激烈冲突的形式直观展现着变迁的时代对不同英雄类型的呼唤，细致描绘了岳鹏程夹在代表传统的父辈革命英雄和指向未来的新生代英雄之间的尴尬处境，探索着形塑新英雄的个人化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关于岳鹏程“改革英雄”的评价，既可视作对他担任推进农村社会改革主将的卓越表现的高度认同，与作家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等城市改革先锋形成一种城乡地域互补，也可从字面出发将其看作“改革”传统英雄评定标准的一种有益尝试。到1991年问世的中篇小说《海猎》，又发出了新时代英雄形象书写的先声。小说中的海狮子等人从事的海洋捕捞工作可谓平凡无奇，但这种从伟大到平凡的转变却极好地契合了和平年代对英雄的期待和要求。刘玉民试图打破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看似严格的界限，赋予了英雄形象新的精神内涵。

一代代的山东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兴趣和执著，显现出一种共同且特殊的创作情结，很好地回答了和平年代是需要何种英雄的问题，杨志军《雪山大地》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山东作家新时代英雄形象书写的一次集中性总结。一生致力于藏区可持续发展的主人公强巴，无意中又造成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真正是一位带有瑕疵的凡人英雄。然而，他的瑕疵或者说所走过的弯路无关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普通人面对严苛现实总会遭遇的失败与挫折，很难规避犯错的可能。英雄并不是无往不利、高高在上的完美存在，正是由于这种“恰到好处”的不完美，英雄得以摆脱不免务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一种相对空泛的“象征符号”变成了更加务实真实的人物类型。新时代文学所推崇的英雄形象书写方式，不再专注于描写看似满足大众的阅读需要实则又与大众不免疏离的英雄，而是试图让英雄真正回归到人民群众当中，讲述平凡英雄的故事。

尽管新时代文学崇尚的英雄最终应该呈现怎样的形态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山东作家迄今努力勾勒出的英雄群像，已经逐渐显现出一副相对清晰的模样。这些英雄从少数“精英”被还原为过去常被忽视的人民大众，大多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着新时代英雄精神。他们的事迹或许远没有达到惊天动地的程度，却似涓涓细流汇聚成海，共同演绎着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故事。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